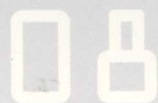


[学苑话题]



严家炎 著

史余漫笔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学苑话题〕

严家炎 著

史余漫笔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余漫笔 / 严家炎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7
(学苑话题)
ISBN 978-7-108-03178-5

I. 史… II. 严…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5114 号

责任编辑 郑 勇 卫 纯
封扉设计 陆智昌 蔡立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 / 16 印张 22.75
字 数 302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自序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几十篇文章，大多写于最近八九年。一部分是随笔，另有不少属于作品评论或是专题论文。各篇之间的篇幅悬殊较大，最短的只有千把字，长的却有一两万字。按此情形，其实书名叫做《短长书》或《长短录》比较合适。无奈这些名称前人已经用过，只得避熟就生，用了现在这个名字。所谓“史余”，指我这些年主要在写作和统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因而是治“史”之“余”的副产品；“漫笔”，则言其体裁之驳杂也。

我把集内文章编为四组，用四句话作出概括，叫做“世纪之交话兴废”，“历尽劫波论五四”，“别梦依稀怀师友”，“偶得闲暇说艺文”，意在说明这些文字有的在讨论文化生态平衡之类问题和上世纪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某些教训；有的围绕“五四”作了一些实证性的考辨，也探讨了诸如启蒙是否被救亡所压倒以及它何以不能持续下去的真正原因；有的怀念各种境况下逝世的老师或友人，提示了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性格与业绩；有的则就特定的文学史现象或作品，较为具体地述说了自己的见解。它们可以说都是我重新阅读和认真思考的一些成果。

由于近期又读到几篇反思陈独秀、鲁迅和新文化运动的文章，我也想在这里再说点自己对“五四”被误读的看法。我认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误读有两种：一种是从“左”的思想路线出发，长期拔高和加浓“五四”本就具有的某种反传统色彩，过甚其辞地认为激进才是反帝反封建彻底性的标志，把“五四”前几年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封建“三纲”、反对在民国宪法中定孔教为

国教、批判宗法家族制度，连同胡适 1921 年称吴虞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1]的戏言叠加在一起，夸大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是一种“左”的误读，它主要发生在中国大陆。也有另一种误读，就是像林毓生先生那样，站在保守主义立场上来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夸大它的激进面，把它看作“全盘反传统”的运动，甚至与“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它们属于同一种性质的应予否定评价的事件。在我看来，这两种误读都是不符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实际的。有一篇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文章，竟将陈独秀 1919 年 1 月《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到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洁、旧伦理、旧政治”的话作为《新青年》“全盘反传统”的证据，这便是极大的误会。这位作者不知道，陈独秀此番话语专指康有为 1916 年向总统、总理上书，要将含有三纲内容的“孔教”定为国教并列入宪法，如果康的主张得逞，便意味着帝制的必然复辟和民权的必然丧失。作为“民主”的鼓吹者和“民权”的捍卫者，陈独秀当然必须撰写《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宪法和孔教》、《复辟与尊孔》等文加以批判和反对，这难道算是《新青年》和陈独秀的罪过吗？我个人，曾在十多年前撰写过《五四·文革·传统文化》^[2]批评了林毓生先生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一书中的观点，新世纪以来又连续发表《〈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释》、《“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考辨》、《鲁迅晚年思想寻踪》等文，都是为了廓清这类误解的。为了显示事情的来龙去脉，我把上世纪 90 年代发表的短文《不怕颠覆，只怕误读》也附收在第二组文章之前，聊供参考。

第三组怀念师友诸文，有作于新世纪的，也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写的，现集中在一起，也算大时代的一个侧面，读者可从中多

[1] 见胡适为《吴虞文录》写的《序》。

[2] 刊载于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 1997 年 8 月号。

少窥见时代的一鳞半爪。

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妻子卢晓蓉。长时间来，是她辛勤地打出了大部分稿子，使它们从改得很乱、难以辨认的手稿变成了电子版；又是她，作为首位读者阅读了这些稿子，曾经给我提出过大大小小的有益建议；而像《心泉也有喷发时》一文的写成，没有她的帮助更是不可能的，应该说，它实际上是我们两人合作的产物。同时我也要感谢编辑郑勇先生的辛苦劳作，他认真审读了全部书稿（除了电子版外，还有一部分是文章的复印件），负责地提出了意见。在这里，我要诚挚地向他表示敬意！

2008年10月28日写毕于北京奥林匹克花园

目 录

001 自序

一、世纪之交话兴废

003 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

006 20 世纪没有白过

009 无用之用

012 民族奋飞的翅膀

014 石破天惊话科学

017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研究随想

025 深入与跳出：文学研究与文化视野

028 批评规范小议

033 鲁迅晚年思想寻踪

040 1957 年夏毛、罗对话试解

046 胡风在四五十年代文学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

052 我读《远东大战纪事》

056 现代性：20 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

066 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展》序

073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丁玲的创作个性

082 回忆我当“保姆”的日子

090 心泉也有喷发时

二、历尽劫波论“五四”

- 101 川岛“文革”中遭迫害一案的真相
- 105 不怕颠覆 只怕误读
- 108 《文学革命论》作者“推倒”“古典文学”之考释
- 116 “五四”“全盘反传统”问题之考辨
- 133 “五四”批“黑幕派”一解
- 138 《郑振铎前期文学思想》序
- 140 苏雪林的文学成就与待解之谜
- 144 由《曹禺访谈录》所想到的
- 146 穆时英长篇小说的追踪与新发现
- 151 略说穆时英的文学史地位
- 156 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
- 160 有关萧军的三点感想
- 163 “有字皆从人着想”
- 166 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173 从“五四”说到“新国学”
- 179 交流，方能进步
- 185 一个痴情者的学术回眸
- 203 论王蒙的寓言小说
- 217 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学术总结

三、别梦依稀怀师友

- 223 “生来注定吃苦”的人
- 228 在我记忆中的慧修师
- 233 心中的丰碑
- 236 悼念文学史家唐弢先生
- 240 精神上的导师
- 244 难以忘却的纪念

- 247 吴组缃先生二三事
251 怀念贻焮先生
255 长长的瞬间
257 他在人们心中永生
261 我心目中的田仲济先生
265 忆叶子铭先生
271 战后日本“中国学”的一位引领者和见证人

四、偶得闲暇说艺文

- 281 闲话小说文体
288 京派小说与现代主义
297 废名小说艺术随想
301 试论电影《贞贞》改编的得与失
311 艺术是升华
313 亲情·乡情·民族大义
321 性灵暖处觅真情
324 张曼菱笔下的北大
327 《幻化》的成就与不足
331 风格之一例
335 让人很开眼界的校园小说
338 《紫雾》：一部颇具震撼力的文学传记
341 试说“中国的奥勃洛莫夫”
349 樊骏《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序言

一、世纪之交话兴废

有关文化生态平衡的思考*

20 世纪即将成为历史。成为历史的最大好处，就是人们可以拉开同它的距离，客观地冷静地对待它，科学地研究它。中国在这个世纪中取得了伟大的进步，也经受了巨大的苦难和牺牲，其中有许多正反面的非常丰富的历史经验需要总结。在弄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于中国在 21 世纪的健康发展，对于世界的进步乃至人类的未来，都具有极大的好处，可以使我们少付出许多不必要的惨痛的代价。

20 世纪在文化方面留给我们最大、最丰富的一笔遗产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这也是我最近几年经常在思考，而且是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的文化，可以有主导地位的成分，需要有主导地位的成分，但同时也需要有多种不同于主导地位的其他文化成分存在，这些不同的成分，构成一种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并在对立中相互吸收、不断更新的关系。于是文化本身就能生动活泼地向前发展，就避免了武断、专制，避免了社会僵化或者停滞不前，更可以避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因为在决策之前就存在一种抵消失误的机制。我相信这就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发展主要依靠一种合力的意思。

任何一个社会想要取得持续的稳定的发展，都需要具备一些基本条件，文化生态保持平衡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在中国古

* 本文是作者在北京大学 20 世纪中国文化中心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代，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道家的与民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孤立的单纯的哪一家的药方，可能都治理不好国家和社会，但当它们构成一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后，好处就大了。如果再加上在下层的墨家，又加上后来传进的佛家，这些思想学说组合到一起，就体现着文化生态平衡。汉初“文景之治”，依仗“黄老之学”，体现着儒道互补。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实际却是“霸王道杂之”，阳儒阴法。唐代是儒道佛三家并存和合流，政治、文化发展得很高，国势也很强。宋明理学又是儒家吸取佛教哲学所获得的重大发展。这些史实都可供我们借鉴。

从上世纪后半期起，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先后出现过种种理论和思潮，有实业救国，维新救国，文艺救国，教育救国，革命救国，科技救国，学术救国等，这些理论思潮在中国的实施程度和影响，何者能起主导作用，何者能起辅助作用，取决于不同时期中国社会的不同条件和不同状况，但它们本身是互为补充，而且在实际行动上互相配合的。如果没有这种配合，武装革命的胜利就会困难得多。即使不同思潮在有些阶段有所对立，也是互补性的对立，而不一定是消解性的对立（康有为在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应除外）。但建国后为了突出“革命救国”，把其他理论思潮均视为“改良主义”、视为“反动”、“阻碍革命”而统统批判，文化生态平衡也就受到破坏，连物质生态也造成失衡。许多教训就是由此而来，很值得我们回顾和思考。

任何文化思潮，不管它本身多么激进，多么偏激，只要有东西制约它，就不可怕。例如“五四”时期钱玄同废除汉字、推行世界语的主张当然很激进，但《新青年》内部就不同意，陈独秀就写了编者按语表示对这种主张有保留。鲁迅也嘲讽钱玄同“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后来还嘲讽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文革”中造反派们推行第三批简化汉字，连“雕”字都要简化成“刁”字，王力先生发言反对，说“要是我敢把‘毛主席雕像’写成‘毛主席刁像’，

我岂不要被打成反革命？”造反派也只好改回来。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不同思想见解能够并存、相互匡正、相互制约的机制。提出文化生态平衡的问题，就是要建立这种机制。

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应该说我们面临一些比较好的条件来研究过去一个世纪的文化状况：第一，可以不限于近代、现代、当代的哪个时段，也不是简单地将这些时段加以拼接，而是有可能追踪寻迹深入到各时段内部，综合地把握整个世纪内在的历史脉搏；第二，可以摒除当事人的主观感情因素，有可能客观地对待业已发生的种种历史事实以及文化上的后果，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建立良好的、严谨的学风。事情的客观过程往往非常复杂，简单地理解就会出差错；第三，各种原始资料越来越多地被发掘、发现和整理出来，其中包括各类档案的逐步开放，对立双方的不同史料可以汇合起来对照、鉴别、互相佐证，这使 20 世纪中国文化的研究不但面对的资料空前丰富，而且更便于将这些资料去伪存真，取精用宏；第四，充分发挥北大作为综合大学优势，通力协作，挖掘潜能，实现文、史、哲乃至旁及政、经、法、社会、心理更多学科的跨学科研究。

所有这些，都使我深信，20 世纪中国文化研究将成为未来的新世纪的一门“显学”。这就是我在北京大学成立“20 世纪中国文化中心”时的一点感想。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9 年 8 月 4 日）

20 世纪没有白过

在即将跨入新世纪大门的时刻，回首百年中国文学，我想说的第一句话是：20 世纪没有白过！经过四五代人的共同努力，尽管历尽种种坎坷曲折，中国文学终于从古典形态不可逆转地发展成了现代形态。这个质的飞跃永远值得我们庆贺！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许多士大夫都感受到国弱民贫的痛苦，都在探索救国的道路。但他们的目标和“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很不一样。他们希望中国通过变法，恢复天朝大国的地位，成为世界霸主。康有为写过一首《爱国歌》，声称“唯我有霸国之资格兮，横览大地无与我颉颃”。辛亥革命前夕有一部小说，畅想中国经过八九十年变革，到 20 世纪末年已经国富兵强，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小说写 1999 年中国上议院决定废除公元纪年而改用黄帝历（公元 2000 年，正好是黄帝纪年 4709 年）。这引起白种人国家的害怕，并引起匈牙利国内黄白人种间的冲突。匈牙利国王请求中国大皇帝出兵保护，终于引发一场世界大战。结果中国在全世界华人协助之下获得胜利，迫使欧美各国签订有利于中国的和约。匈牙利从此也改奉黄帝历。于是万国来朝，中国达到鼎盛时期。这种梦，“五四”以后的作家不会再做了——不是认为不可能，而是认为根本不应该。鲁迅把这类救国目标叫做“旧式的觉悟”，加以谴责。当有人论及日本并吞朝鲜这件事而津津乐道于“朝鲜本我藩属”时，鲁迅感到这类思想的“可怕”。无论在对待国外的弱小国家，或者对待国内的弱小民族方面，鲁迅都主张平等，支持正义，倡导和睦相处。他不愿自己做别人的奴隶，却也不愿别人做自己的奴隶。正

是在这一点上，体现了鲁迅思想的现代性，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测量出了“五四”作家与康有为那代人思想上的距离。“五四”一代作家接受的是人的个体本位价值观念。戊戌变法时期的谭嗣同，虽然在《仁学》中首揭“个人自主之权”，但那还只是先驱者个人的觉悟；只有到“五四”时期，这种思想才成为一代人的共识，形成时代风尚。所谓“文学革命最大功绩在于‘人’的发现”，这“人”，就是个体本位意义上的“人”，其内涵就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和意志。用《伤逝》女主人公的话来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接受这种个体本位思想，对于历来只强调君权、族权、父权、夫权而不强调个人权利的中国人来说，是价值观的巨大变化，是人文精神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既然要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也就意味着人们不但要懂得自尊，还要懂得尊重别人；自己不受别人压迫和损害，也不去压迫和损害别人。这就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提出要改变“人吃人”现象、自觉地做“真的人”的实际含义；也是《故乡》中“我”听到闰土叫一声“老爷”，禁不住从灵魂深处感到震撼，强烈地要求打破人和人之间那层“可悲的厚障壁”的原因；以及《阿Q正传》中鲁迅为“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感到愤怒，同时又为阿Q式的革命本身感到悲哀的道理所在。这种个体本位思想，不但不能误解为自私自利，相反，倒是和正确地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和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通的。

文学的现代形态，还包含着另一种含义，那就是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人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多样。白话诗文的出现，小说地位的提高，话剧艺术的引进，传统戏曲的革新，都使人民大众在即将过去的世纪中有可能直接享受着自己的文学。而文学的多种形式、多种风格、多种题材、多种流派、多种创作方法同存共荣，自由竞赛，实际上也在实现百花齐放，发挥着多种功能，共同为人民的事业服务。长期实践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题材、形式、风格、创作方法等等都只有相对的意义。选择其中的某些方面

加以倡导，这很有必要，但如果走向独尊，则又会无益有害。离开了创作主体，无论何种优越的题材或创作方法（包括现实主义在内），都决不会有神奇万能的功效。真正对创作起决定作用的，归根结底还是作家文化学养的高低、人生体验的深浅和文学创造才能的不同。在这方面，永远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回顾百年文学，我们不但看到群星灿烂、成就辉煌的景象，更为中国的现代文学早已走出峡谷、踏上康庄大道、可以纵横驰骋而无比高兴。相信现代形态的中国文学，定能创造出更大的辉煌！

（原载 2001 年 1 月 17 日《光明日报》）